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A:
RECORD FROM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編

20世紀初的中國印象

——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20 世紀初的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 /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9
ISBN 7-5325-3002-7

I .2… II .上 … III .中國—近代史—1901~1911
—史料 IV .K257.06—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58358 號

20 世紀初的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a: Record from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編

特別鳴謝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製 版: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 1194mm 1/12
印 張: 29 $\frac{2}{3}$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1—3,000
書 號: ISBN 7-5325-3002-7/K · 334
定 價: 200.00 圓

封面照片: 1912 年 1 月 1 日上海各界在北站歡送孫中山赴寧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施塔福攝)

20 世紀初的中國印象 —— 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a: Record from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策 劃： 盧漢龍

主 編： 潘君祥

副 主 編： 錢宗灝

編 委： 丁 法

潘君祥

(按姓氏筆畫) 胡寶芳

錢宗灝

張瑞岳

盧漢龍

傅為群

羅納德·安德森 [美]

裘爭平

顧柏榮

編 務： 張 毅

張 宇

策劃編輯： 張曉敏

執行編輯： 府憲展

特約編輯： 施宣圓

責任編輯： 李震宇

技術編輯： 王建中

責任校對： 金文男

裝幀設計： 劉 菲

序言

歷史工作者實在應該感謝攝影術的發明。一些留存下來的舊照片，可以把一個世紀前的社會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它有兩個優點是其他歷史資料難以替代的：一是高度的客觀性，二是形象的生動性，使看到它的人有如身臨其境，許多細節以往在文字資料中根本沒有記錄下來，以至後人只能靠想象去補充，這往往容易失真。

儘管如此，要找到反映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有價值的照片却極為不易。那時，攝影術傳入中國還不久，大多用于拍攝個人肖像。即便想拍攝一些社會情景，由于拍攝者活動範圍的限制，不僅照片的數量少，而且內容也常比較零碎。不少照片又因為攝影技術差的緣故，清晰度差。至于後人從當時報刊上翻拍下來的那些照片，就更模糊不清了。加上照片保存不易，在漫長的歲月中極易散失。像前面所說那樣有歷史價值的照片，只能說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正因為如此，聽到美國攝影師施塔福先生留下上千張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包括一些重要的歷史場面的照片，他的後人又把這些照片的副本捐贈給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並且慨允公開出版，真令人有點喜出望外。

施塔福先生有許多令人難以具備的優越條件：他在1909至1915年這六年間生活在中國，在我國當時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當攝影記者，接觸面廣，許多其他人難以在場的地方，他不僅可以在場，而且可以自由拍攝；他興趣廣泛，除重大歷史事件外，對自然風光、城市風貌、

社會習俗、各行各業以至民衆的苦難生活等，都能一一攝入鏡頭；他又有嫺熟的攝影技術，配備着良好的攝影器材，所攝的照片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好。感謝他的妻子、女兒和外孫，在他去世後仍能將這批珍貴的照片細心地保存下來。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從這上千張照片中，精心選出500多張，編成這本畫冊。書名起得很好，叫做《20世紀初的中國印象——一位美國攝影師的紀錄》。照片原來大多沒有說明，博物館的同志對照片內容進行了認真的考訂，作出比較準確的解釋。沒有他們的努力，這些很有價值的照片也難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

還需要提到，在這批照片中有關辛亥革命的內容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直接表現這方面內容的有150張左右，間接涉及的還有約300張，它們大多已編入這本畫冊。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決定在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時推出這本畫冊，就使它更有一份特殊的意義。

承編者的好意，在本畫冊出版前讓我先看到了一部分照片，並且告訴我這些照片的來歷，使我感到很興奮。因此，為本畫冊的出版寫下這樣一些話，也可以算是序言吧！

金冲及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中國史學會會長、教授

辛亥革命——現代中國的起源

這是一本由美國友人安德森提供的歷史照片編輯而成的圖錄，它記錄了安德森的外祖父施塔福當年在中國拍攝、保存的歷史鏡頭。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 500 多張已有將近百年歷史的老照片，以啓迪人智的深邃內容、震撼人心的真實畫面把我們帶回到二十世紀初的舊中國。

上個世紀初的中國，經歷了外國列強無數次的武力強暴，更忍受着封建統治者顛頂無知的專制。昔日祖宗的榮耀猶存，秀美的山川依舊，但治國平天下的國家機器已破舊不堪。經濟凋敝，民生維艱，封建的農村經濟已經陷入了即使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都十分困難的境地。成萬上億的農民，要麼在他們祖輩耕耘的貧瘠土地上輾轉掙扎，要麼被天災人禍逼走他鄉，流離四方。在最早被迫對外開放的沿海沿江地區，外國商品滲入各處，衝擊着原來封閉的經濟秩序。外國傳教士則深入社會下層，與中國原有的儒學佛道分庭抗禮。邊疆的危機和烽火，已使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似大廈將傾，中華民族正經歷着它前所未有的苦難。在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下，偌大的一個東方帝國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環，成了爲洋人效勞、“結與國之歡心”的小朝廷。十九世紀末維新志士譚嗣同撼人心肺的詩句：“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已將現實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辛亥武昌起義是近代歷史上一次具有真正意義的革命。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發的武昌起義是革命黨人在新軍中進行長期艱苦的宣傳、組織活動的必然結果。在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前，文學社成員在新軍中已發展至 3000 多人，占湖北新軍總數的五分之一。1907 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共進會，辛亥革命前在新軍中發展的會員也超過 1500 人。兩個革命團體都有合作的願望，便在同盟會中部總會的直接介入下制定了武裝起義的計劃。從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英勇就義，革命軍占領武昌算起，革命軍和清朝軍隊在武漢地區對峙交戰長達兩個月，它吸引了清軍的主力，爲各地的起義響應創造了條件。據當時的一個統計，革命軍方面“殉國有姓名可記者，只三十二人；無姓名而確記數字者，四千二百八十餘人；死傷混列者爲二千三百七十餘人；受傷未列者爲一千七百三十五人”。可見，這是一場用鮮血換來的、真正的革命！幾千位革命者用自己的頭顱和鮮血換來了推翻封建專制皇朝的勝利果實，也書寫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新篇章。

施塔福在華工作、生活的上海是近代中國被迫對外開放的窗口。中西兩種文明的衝撞和交匯時時在照片中顯露出來。黃浦江面上外國巨輪和中式木帆船穿梭往來，無軌電車行駛在城市中心的馬路上，外國航空技術也被介紹進都市。古老而喧囂的廟會背後却是近代企業的高大烟囱，它極不和諧但又十分真實。繁華的都市商業，新式的教育，近代的報館和西式的公園并存，總之，上海的一切都在改變。

外灘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洋樓，帶有殖民標記的雕塑，黃浦江上的兵艦以及維持着租界秩序的外國警察……讓人們感受到上海城市在近代化的同時也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

商務印書館是施塔福服務的企業，也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施塔福當時把先進的三色照相製版印刷引入中國。照片反映了商務印書館生產的主要流程：從鑄字排字、紙版和鉛版製造，到印刷裝訂的生產流程；從總事務部、編譯所到繪畫部、照相製版部等印書館內部組織機構；從企業創辦人、普通員工到附屬學校、消防隊；甚至企業的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施塔福的鏡頭都有所攝錄。透過這批照片，我們可以對商務印書館這一我國最早的現代出版企業的歷史有一個直觀、清晰的瞭解。因為1932年“一·二八”日寇轟炸，商務印書館的檔案資料毀於一旦，人們難以窺見這一著名近代企業早期發展的情況，幸好施塔福的照片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除了工作、生活的上海以及辛亥首義的武漢以外，北至帝都燕京，南至“割地”香港，東到煙臺口岸，西至四川盆地，施塔福涉獵甚廣。古樸純正的華夏民風，秀美壯麗的山川風貌，艱辛苦難的民衆生活，破敗落伍的社會經濟——被他攝入鏡頭並保留下來，成為二十世紀初舊中國的一本珍貴寫真集。

在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下，舊有的政治經濟體制的破敗落伍是必然的。透過這些老照片，人們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歷史步伐前進的節律。近代西方商品不僅在沿海城市銷售，還向內地窮鄉僻壤滲透，它無情地摧燬着舊制度的根基。新興的工商企業已艱難地產生，而且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正在崛起。在這種新經濟制度的母體裏，正孕育着新興的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是中國新制度誕生的希望。在遭受了多次學生總是被老師毆打的經歷後，中國先進的人們已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和幫助。總之，無產階級政黨誕生的晨曦已經開始顯露，這就是歷史的必然。

從這一角度講，我們也可以把辛亥革命看作是現代中國的起源。

衆手成書，本書的出版受到了上海市文管委領導的關心和指導，上海氯鹼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給予了科研上的支持，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丁法經理也始終支持此項工作，《文匯報》資深記者施宣圓先生參與了本書的出版策劃，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曉敏先生為本書的及時出版傾注了心血。在此，我要對以上單位和個人表示由衷的感謝。

潘君祥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

二〇〇一年七月

將歷史的寫照——還給中國人民

1997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講學訪問時，社會學系的邊燕杰教授對我說：“我們系裏有位安德森教授（Ronald E. Anderson），他外公以前在上海呆過，拍了許多照片，凡是有中國朋友來，他都要拿出來討教，想瞭解這些照片是在哪裏拍的。你是上海人，你應當知道得更多些。幾時我來約一下，大家見見面。”

燕杰原是天津南開大學畢業的社會學碩士研究生，八十年代中期赴美深造，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學成後到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是個年輕有為的學者。我和他相知有年，便慨然應允。記得那時正好是中國的農曆春節，燕杰便約我和安德森到他家裏做客。邊太太慶紅準備了一席地道的中國年夜飯，安德森和他的太太南希一起來到邊家相聚，同時帶來了厚厚的幾大本照相册。

聽安德森說，他外公有個中文名字叫施塔福（Francis Eugene Stafford），1909年帶着妻子和兒子（即安德森的舅舅，當時安德森的母親還沒有出世）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在上海商務印書館（Commercial Press）當攝影記者。1915年離開中國到夏威夷後回國。在差不多六年的時間裏他足跡遍及中國許多地方，並用他的相機留下了許多照片，從自然風光、人文古迹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應有盡有。更有意義的是，那時恰逢中國的革命年代，可以想象，在風

雨飄搖的辛亥年間（1911年），他身為外國人，又有攝影技術，這些特殊的條件使他得以較為自由地穿梭于革命（新）軍和清軍的陣地之間，留得許多珍貴無比的寫真。

翻開安德森的照相本，我心頭難以抑制的好奇感終於得到滿足。在這些照片中，我不但看到十分熟悉的上海各界歡送孫中山離開北火車站赴南京就任大總統的合影場面（還有合影前散亂人群的幾張留影，未見有流傳），而且有許多武漢戰場兩軍對峙、戰場殺戮的真實鏡頭，和革命時期的其他一些細節記錄。

安德森的母親是1912年（壬子年）在上海出生的。根據他母親的回憶，五歲時她離開中國到夏威夷。她的父親，即施塔福在那裏教中文，但一直和上海商務印書館保持聯繫。三十年代初施塔福又曾來到中國，在出版和攝影方面對中國有諸多貢獻。但可惜，長期的奔波辛勞和暗房工作使他患上了肺結核病，1936年他回到美國後英年早逝，享年僅50出頭。他留下的成千張有關中國的照片，一直由安德森的母親珍藏。

當時我翻着安德森帶來的這幾大本泛黃的美式相冊，不由心潮涌動。一張張清晰的相片記錄了差不多上百年前中國的歷史風情。在美國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明尼蘇達居然留存着開啓古老中國現代化新紀元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真實。我雖然從小在上海長大，對於城市發展的歷史與典籍多少也有點見識，而且又正在負責《上海通志》“社會生

活卷”的編撰工作。但是我深知這批攝影珍藏的價值非我能一一認定。所以我便對安德森說，如果他願意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聯繫專家將這些照片整理認定，並且和燕杰一起極力慫恿他將這些收藏的照片公諸于世。安德森說，他的母親還健在，今天他帶來的只是一部分，母親和他的妹妹那裏還有更多的照片，他會設法說服她們讓所有的照片跟那些和它們更有關係的中國人見面。

回國以後我馬上做了兩件事，第一是和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潘君祥館長聯繫。我相信上海歷博是最適合于認定這些照片的單位。第二是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領導聯繫，我想這是和這些照片有直接關係的部門。我的努力得到了君祥兄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願意對這些照片進行專家鑒定，並對照片的價值表示極大的興趣。施塔福工作時的上海商務印書館館舍燬于淞滬戰役日軍“一·二八”的轟炸，商務印書館也在五十年代遷往北京，上海原址成為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現已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總經理丁法對施塔福的故事也甚感興趣。他告訴我，商務廠是一家百年老廠，有深厚的企業文化積累，至今還有廠史辦公室，集中了一些老員工。他們也許能對這些老照片的背景提供一些綫索。于是我便將這些好消息告訴安德森，希望他能安排時間到上海來一次。

1998年聖誕節，安德森夫婦帶着部分照片來到上海。這是一次令人難忘、極有意義的訪問。我先陪他們到上海市

歷史博物館。君祥兄和錢宗灝副研究館員等接待了他們。當他將五、六大本約四、五百張泛黃的老照片攤上桌面時，有着多年研究經驗的專家們立刻被吸引住了。到底是上海史的專家，他們對大部分照片的背景和內容均能辨認出來，當然也有一些需要進一步考證。他們對這些照片的歷史價值均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當時我們就共同合作整理這些照片，並設法讓它們公諸于世達成了一致的看法。

接着，我又帶安德森訪問了在閘北天通庵路上的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有限公司。那天正好是12月24日，也就是西洋聖誕節的前夜。丁法請來了廠史辦的老同志，商務館的創始人之一張元濟的大公子、當時已是九十高齡的張樹年先生也來了。安德森夫婦饒有興趣地參觀了商務印書館的廠史成立室。廠史辦的同志翻開一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三十年代編的館史紀念冊，查找到了其中有關施塔福先生的記載。原來施塔福先生在當時曾將世界最先進的三色鋼板膠印技術引入中國，是對中國的現代印刷技術有突出貢獻的工程師，也是當時商務印書館得以在東南亞獨領印刷風騷的有功之士。令商務廠的領導和員工們十分激動的是，從安德森的照片裏，他們發現了商務印書館初創期整個廠區的全貌圖，以及當時許多工作、生活與管理的生動場景。這些或燬于戰火，或已湮沒的歷史狀況的原始錄存對享有盛譽的百年商務來講是多么寶貴的珍藏。張先生特別高興地發現安德森的相冊裏有一張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先生

的全家福照片。他說，1997年商務印書館百年大慶之際，翻遍所有的現存資料都找不到一張有關夏瑞芳私人生活的照片，萬萬想不到在美國倒存有他全家的留影。那晚丁法總經理就在商務印書館的飯廳裏請安德森夫婦一起用餐。大家興致十分之高，尤其是張樹年老先生，當年正是他的父親聘用了施塔福先生當攝影師。他回憶了那時父親通過美國印刷出版界的朋友派遣員工到美國學習先進印刷技術的往事，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年代赴美留學的。所以當他聽說施塔福一直和商務印書館有聯繫，三十年代又曾重返中國，感到特別的親切。安德森夫婦十分感慨又愉快地在他外公工作過和母親出生的地方——中國上海度過了一個終身難忘的聖誕之夜。這頓在中國的聖誕晚餐如同那次在美國的春節年夜飯一樣，對本書的出版十分重要。

在這以前，中國對安德森來講是一片神秘而又遙遠的土地，他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他的工作與生活也和中國沒有多大的關係。中國只是在他外公的照片裏，是一個如夢一般斷斷續續的片段。這次中國之行使他親眼目睹中國的巨大變遷，現實與老照片成為多麼強烈的對照！他十分希望中國能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這些照片，原先對瞭解照片背景的好奇心變成了將這份歷史的寫照還給中國人民的責任心。歷史博物館的專家們也對勘定這些歷史寫真的內容充滿信心。于是我們便商定和安德森合作做兩件事。一是用這些珍貴的照片舉辦一些展覽會。主題可以有多種，其中

辛亥革命的題材當然是首選；二是爭取出版一本影集，嚮世人較全面地展示二十世紀初，中國從清末到民初這一重要社會轉型期的歷史風貌。我和安德森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學者，對於這些照片的社會研究價值特別感興趣。安德森答應他願意無償提供這些照片在中國出版。同時，只要編輯需要，他可以用電腦將照片製成數碼文件，快速、便捷、高質量地用于出版，大家都覺得十分興奮。

然而好事還是多磨，辦展覽和出影集并非易事。首先碰到的是經費的問題。當時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又正在考慮搬遷重建，展出的場地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決定一方面由安德森徵得他家人的同意，將所有的照片集中進行甄別、挑選，並製作成電腦文本。另一方面，我們在上海對這些照片進行宣傳，爭取社會的支持。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潘君祥館長和錢宗灝兄的不懈努力。他們組織了館內外的專家對照片進行了大量的甄別和研究工作。同時，他們又通過媒體宣傳和介紹這批照片的價值。感謝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上海英文日報、上海電視臺的記者，他們陸續報導了有關這批封存了百年的歷史照片的新聞，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2000年夏，中央電視臺大型文獻記錄片《孫中山》攝制組和我聯繫，他們對安德森收藏的老照片、以及他外祖父的故事很感興趣，希望能和安德森取得聯繫。這時正好安德森有機會來中國，也想就展覽和影集的事和我們作進一步的討論。于是中央電視臺的攝制組專程來上海攝

14

錄了安德森在上海訪問的情況并對他進行了採訪。那次活動匆匆一天，排得滿滿的，但十分有收穫。新華社也以“塵封百年見證歷史”為題對這位美國攝影師的中國照片作了報導。此後中央電視臺攝制組在美國收集錄制孫中山歷史資料時又順道在洛杉磯採訪了民國元年在上海出生的安德森的母親。我跟安德森說，你外公的故事如果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話，那麼會有數以億計的人知道這件事，更多的人想看到這些照片，他大受鼓舞。當然，這也更加重了我們應當盡早將這些照片編輯出版的壓力。終于，經過了各路專家的努力和有關部門的支持，這本見證歷史的珍貴影集如今面世了。

我相信，現在奉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影集是施塔福所有帶回美國的中國照片中最精彩、最有史存價值的部分。據安德森的母親回憶，她父親多才多藝，一生鍾情攝影并從業出版，在傳播文化方面有執着的追求。他身後留下五大本相冊、上千張中國照片，均仔細粘貼在黑卡紙上，放在箱子裏。安德森母親成人後搬過五次家，每次搬家都要扔掉許多東西，惟獨不舍得扔掉這些老照片。因為這裏面有她出生地方的影像，這個地方她雖然很陌生，但是箱子裏的這些老照片能告訴她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在她出生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這些老照片因此隨她也搬了五次家。安德森以他作為社會學家的職業興趣，感知到這些靜靜地躺在母親家閣樓裏的照片的社會價值。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將所有的照片掃描成十分清晰的數碼文本，製成光盤送給我們。二十世紀初的攝影技術在二十一世紀初電腦技術的支持下再現它的風采。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老照片均由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組織的專家進行認定和編撰，歷史的畫面因而顯示了豐富真實的底蘊。我相信，這些照片所留下的信息十分豐厚。它展現了中國在結束帝制進入現代文明這段重要時期裏比較完整的社會風情和生活畫面，從而必將成為研究中國開啓現代進步年代的社會、經濟和人文的重要感性材料。它的出版必定會引起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等多種學科、多種方面研究者的興趣。它也將為中國的廣大讀者提供一份珍貴的精神產品，使人們得以更直觀地瞭解我們前輩的生活，瞭解在這片歷史累積深厚的土地上、在那個感受蛻變的時代裏曾經發生過的故事。

盧漢龍

上海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二〇〇一年六月

攝影家 Francis E. Stafford (施塔福)

我們弟兄姐妹幾個從小就一直聽母親講述關於我們外祖父施塔福的十分引人入勝的故事，她還拿出外祖父拍的照片給我們看。就這樣，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外祖父真是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對我而言他又顯得如此之神秘，因為他的經歷和照片留下了許多不解之謎。我的母親保存着五大本、共一千多張外祖父拍的中國照片，可沒有一張照片留有任何文字注說。後來，我成爲了一個社會學家，出于職業原因，我對中國產生了好奇，并且很想知道外祖父當初在那

個遙遠國度裏的經歷。自從1997年母親將這些照片給了我以後，我就開始到處請教，試圖確認照



安德森教授和他外祖父的相冊

片上出現的人物和地點。這些努力現在終於有了結果，在上海歷史博物館的統籌安排下，即將舉行我外祖父的攝影圖片展，而這本堪稱史冊的影集也終於得以問世。在談論這些照片之前，讓我先簡要介紹一下我外祖父的故事。

1884年2月3日，我的外祖父福蘭西斯·尤金·施塔福 (Francis Eugene Stafford) 出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市 (Boulder, Colorado)，他的父親是那裏政府的一名公務員。17歲時，施塔福搬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山景市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在太平洋出版公司 (Pacific

Press) 搞印刷工作，并逐漸成爲一位照相製版和攝影的專家，這使他後來得以供職于上海商務印書館。1909年，他携妻子愛倫·瑪麗·杰森 (Ellen Marie Jensen) 和3歲的兒子克拉倫斯 (Clarence) 遠渡重洋來到上海，一家三口在上海河南北路21號*租了一套房子住下，開始了他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六年之後，即1915年，他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國，直至1932年，他作爲安息日教會的傳教士再次到上海住了兩年。1938年，他因病去世，安葬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格倫代爾市 (Glendale, California)。

外祖父施塔福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到中國以後，他馬上就愛上了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文化，并很快學會了用中文閱讀和寫作。我母親說他喜歡講中文，他後來定居在夏威夷檀香山 (Honolulu) 時，實際上就當了一名中文教師。因為照片是他拍的，所以大多數的照片上都沒有他。但是個別照片中有他，我們可以從照片上感受到，他是那麼熱衷于中國文化，對這片土地以及那裏的人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也是他之所以拍下這麼多的照片，并花大量時間將它們收集粘貼成冊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祖父具有多種藝術天分，多才多藝。除了印刷和攝影，他還是一位音樂家和畫家。由此他喜歡研究色彩并成爲早期彩印技術方面的專家也就不足爲奇了。在1932年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紀念冊上，記載着關於施塔福引進美國彩色印刷技術的歷史。這便是三色套印技術，這在他收集保存的相片中也有幾張樣品。瑪麗·蓋姆威爾 (Mary Gamewell) 1916年所著的《通往中國之路》 (Gateway to China, 132-133頁) 一書中寫道：“商務印

書館是最早將三色印刷術引進中國的企業”，她還提到“一位來自美國的專家帶來三色套版的印刷術，並且教會中國工人，使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而且這些印刷術當時是“遠東第一”的。

從母親那裏得到外祖父珍貴的老照片之後，我足足花了好幾個星期在圖書館裏翻尋資料，研究古籍，還不斷向中國來的人請教。我在一些老書中發現了不少外祖父的作品，看來他是受



安德森教授的母親身穿龍袍

商務印書館聘請，為當時出版的書籍拍攝照片的。其中一本是1911年出版的“中國地理”(Geography of China)教科書，它收錄了外祖父所攝的25張照片，還有專門的文字解釋。另一本書名為《中國大革命：1911-1912年》(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為愛德溫·丁格爾(Edwin Dingle)所著，商務印書館1912年出版，其中也載錄了許多外祖父所攝的照片，比如著名的辛亥年武昌起義中清兵和革命軍對峙的場面。

為了進一步弄清這些照片的出處來源，我和妻子南希(Nancy)于1998年來到中國，我們不僅游覽了大部分照片的拍攝地——上海，還去了杭州、蘇州和北京，在那裏也找到許多照片中的痕迹。在北京頤和園，我們驚喜地找到了外祖父拍攝宮殿拱頂時所站立的位置。到了杭州的岳飛

墓前，我們判斷外祖父在那裏的照片，很顯然是運用廣角鏡頭拍下的。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們發現從1910年到現在，建築物和雕塑已發生了細微的變化，而部分的廟宇、塔樓和房屋建築則在戰火中被摧燬了。這些老照片能使我們從各個側面更多地瞭解中國的歷史。

仔細觀察照片中人們的衣着打扮和活動情景，會發現這些照片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辛亥年間中國文化的途徑；通過把當時的圖像同今天的生活進行對比，以及深入分析各種變遷的原因，我們可以從照片中發現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解讀這些照片是一件極具挑戰力而又令人興奮的事。我十分感激在這一過程中幫助過我的人，尤其是要感謝盧漢龍教授和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研究人員。

福蘭西斯·施塔福強烈地渴望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中國出點力。他利用當時的科學技術和相冊中的照片圓滿地完成了這一心願，他同樣激勵着我要為中國人民作貢獻。我的教學研究領域主要是關於新興數碼電子技術對世界教



施塔福的後代

Francis E. Stafford

育的影響。一百年前，我的外祖父將彩色印刷技術引入中國，一百年後的今天，我也希望能為中國發展數碼電子技術用于教育事業出力。我真誠地希望中美之間這種類型的合作與愉悅分享，能在未來的日子裏，愈發欣欣向榮。

羅納特·安德森 (Ronald Anderson)

中文翻譯：盧咏

(本序作者安德森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本書照片攝影師的外孫。攝影師 Francis E. Stafford 來中國以後有一個中文的名字：施塔福。在他的相片中出現過他自己用中文簽的名。在商務印書館 1932 年的紀念冊裏關於他的記載也以施塔福為名，所以我們在本序的中譯文裏直接用他的中文名。)

* 今河南北路 21 號為山西中學。

目 錄

序一	金冲及	8
序二	潘君祥	9
序三	盧漢龍	11
序四	安德森	15

1

真實的紀錄——苦難動蕩的中國

- 風雨飄搖中的大清
- 哀民生之多艱
- 等待醒來的睡獅

2

定格的歷史——辛亥年的民族民主革命

- 革命火種的撒播
- 爲了共和制的理想
- 社會各界對武昌起義的反應
- 革命烈火燃遍全國
- 共和曙光初現華夏

|| 1

|| 67

3

|| 139

攝影師的眼光——充滿活力和希望的城市

- 那裏不憎恨洋鬼子
- 五方雜處的上海灘
-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4

|| 211

工作與謀生——在商務印書館

- 中國出版業的鉅子
- 謙謙君子的經營之道
- 在商務大家庭裏

5

|| 265

鏡頭的漫游——民國初年的神州大地

- 旅行者的好奇與讚嘆
- 夕陽中的帝都宮闕
- 透過鏡頭的思考

後 記

|| 336